

■学人素描

# 赫尔普曼：为新贸易新增长两大理论奠基

◎史晨昱

传统经济增长和贸易理论建立在边际报酬递减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基础上。现代各国的经济实践表明,以报酬递减法则所支配的竞争均衡愈来愈缺乏说服力,相反与动态相关联的报酬递增则愈发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作为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二次与第三次浪潮的新贸易与新增长理论崛起,同时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具有冲击诺贝尔奖实力的经济学家。其中,为人低调谨慎的艾尔哈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因奠基性出色贡献一直是两个领域的全球领军人物之一。

赫尔普曼是1946年生于前苏联的犹太人,1957年移居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9)和硕士学位(1971)后,于1974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到特拉维夫大学任教,1997年以后兼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在方法的精妙和问题的创新方面,国际经济学界向来不乏笔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行者,但是赫尔普曼所到之处,往往要掘地三尺,把前人混乱、片断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个井然恢弘的体系。他的为人一如其学术研究,始终井井有条;课堂上板一眼,绝少有外话;办公室里面纤尘不染,连桌子上的工作论文都理得整整齐齐,绝不乱了秩序。

## 新贸易理论模型探索 不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家之间交换不同产业产品即产业间贸易的动因源于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各国进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迅速上升;产业内贸易也在快速增长;一国在同一产品上既有进口又有出口。现实呼唤新的国际贸易理论。

7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借助产权、交易费用、理性预期、博弈论等新工具来分析产业内贸易现象。他们转向了收益递增或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而这必然意味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在“收益递增、不完全市场和贸易理论”(1984)一文中,赫尔普曼系统归纳了这些重要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法。他提出,规模变化通常会带来效率变化。规模经济可以分为两类,即外部规模经济(产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与厂商扩大产量具有同向关系,较大规模的厂商能更好地克服技术设备的不可分割性,能更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同时,还能降低单位产出的行政管理、营销费用等。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同行业其他厂商的排斥



赫尔普曼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期间结识了保罗·克鲁格曼。二人合作的结果是《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一书的出版。书中将各自为战、种类繁多的理论模型作了一番综合,一面从中提炼出共同要素,另一面又构筑起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延续性,建立了自己的模型来分析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的国际贸易。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正式形成,两位同时也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开创人的地位。

性,意味着内部规模经济要求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赫尔普曼由此总结了企业竞争类型、市场基本特征两方面的市场情况,分析说,一旦将收益递增引入分析框架,竞争类型和市场结构特征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有重要影响。例如,假定存在两个规模不同但偏好相同的国家,各自都具有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两个行业,那么,较大的国家将进口垄断行业产品、出口竞争行业产品,而较小的国家则在垄断行业享有比较优势。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不完全竞争情形下的贸易政策,通常具有不同于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的结果;市场结构对贸易政策的实际作用具有重要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行为的差异:在完全竞争下,企业最优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将使得边际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由于企业的预期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需求曲线的斜率,而且取决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反应,因此贸易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

两位比较通过分析并归纳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提出了各种市场结构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1)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贸易形式是反映比较优势的行业内贸易,自由贸易政策最佳;(2)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贸易形式表现为反映规

模经济和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最佳;(3)国内国际市场完全竞争,国外市场是垄断或寡头垄断,国外企业出口存在超额利润,因此可通过最优关税抽取这部分外国租金,且不受国内进口限制;(4)国内市场是垄断或寡头垄断,国外是完全竞争,若国内垄断或寡头垄断行业为幼稚产业,可实行一定程度的关税保护,并且执行一定的保护期,保护期完毕即撤除关税。此外,视国内垄断程度的不同,可斟酌使用配额。关税与配额相比要优,如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将产生竞争效应,则国内价格下降,产量上升。

## 新增长理论揭示经济增长内生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日益变得以知识为基础。经济现实的这种深刻变化要求经济理论做出相应的解释与说明。于是,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开始探讨运用新的增长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是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是“内生的”。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是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发(R&D)部门生产,并且具有独特、非竞争和部分排他性。内生技术进步包括内生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模仿)。将内生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纳入内生增长理论的任务是由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共同完成的。

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认为,技术创新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意识的研发投入,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企业投资R&D的基本动机。无论是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是新产品种类的增加,抑或是新产品质量的提高,都得益于R&D的努力。

在开放条件下,人们更多地关注于知识的国际溢出、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首先研究了小国开放经济。小国的创新活动仅在非贸易品部门发生,最终产品按国际市场上外生给定的价格进行交易。他们发现,贸易与内生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只有当贸易使资源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R&D部门,贸易才会促进创新和增长。他们还认为,当贸易政策提高了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或降低了本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时,贸易政策就会促进创新。贸易对福利水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中间产品产量的变化,只要贸易政策鼓励了中

间产品的生产,就有利于福利水平的提高。其次,他们进一步研究了开放条件下大国的贸易与内生技术创新及增长的关系,考察了贸易影响长期创新率与增长率的渠道。他们认为,贸易促进了知识的国际溢出,激发了创新者之间的竞争,减少了研发活动中的重复劳动,提高了研发部门的总生产率。在技术存在国际溢出时,两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的贸易必定会提高各自的创新与增长率。他们还考察了两种特殊情形:(1)非熟练劳动力禀赋丰富的国家可能因为贸易而专业化生产传统产品,从而使总产出增长率下降;(2)贸易有可能使人力资本禀赋丰富的国家从事研发活动的动力降低,尽管如此,贸易为该国居民提供了消费国外创新产品的机会。

为了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对发达国家的创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扩散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贸易对各自经济增长的影响,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年发表了“质量阶梯与产品周期”一文,提出了内生创新与模仿的质量

竞争两类产品周期模式。该模式认为,新产品首先在发达国家研发出来,随后为发展中国家所模仿。对研发活动的投资,取决于潜在的收益与研发成本的理性分析比较。由于新产品要优于老产品,发达国家成功的创新者在一定时间内能够获得利润,而当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开始后,创新者的利润逐渐流失;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厂商由于成本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成功的模仿者同样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利润,但当发达国家的创新者推出更新的产品时,其利润流也会被打断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就这样,发达国家的领导者、追随者与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者之间的创新与模仿的博弈,保持了总的创新率与总的模仿率不变,维持了贸易与经济的稳定均衡发展。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赫尔普曼总结出了一套维持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政府政策。他与格罗斯曼先后出版了《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特殊利益政治学》等专著,对民主社会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策制订有开创性的理论研究。

## ■本期人物话语



## 财政部正酝酿财税政策组合拳

金人庆(财政部部长)6月27日上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受国务院委托提出2006年中央决算报告和中央决算草案中称,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财政部正积极采取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些财税政策措施包括研究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研究出台缓解贸易顺差财政“组合拳”政策措施,研究出台支持节能减排工作的财税政策措施、研究改革资源税制度等。

## ■多声道

### 内地与香港证券市场有相当互补性

屠光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近日说,到目前为止,共计有143家内地企业在港上市,其中113家的赴港上市时间是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H股公司和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即红筹公司)合计市值已占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的一半,这些企业的股份交易量也占到港交所总交易量的近六成。从效果看,内地与香港的证券市场合作比香港回归之前更有效。这不但巩固了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对内地金融市场和企业自身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通过到香港上市,内地企业不但筹集了资金,提高了国际知名度,而且完善了公司治理,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境外上市的首选地的趋势不会改变。企业选择在内地或者香港上市都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内地与香港证券市场扮演不同的角色,彼此有相当的互补性。企业应该利用好这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 破解民企融资难正从两方面推进

黄毅(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主任、研究局局长)日前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首先要从政策导向上加以引导。现阶段监管机构正在着力从两个方面推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第一是从政策导向上支持金融机构、金融企业包括其他类型的企业为民营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第二是从银行自身改革着手。过去银行只会做大买卖,现在要从做大买卖改进到做小买卖,从过去对公到主要对私人服务,从过去提供简单产品服务,到提供多层次产品服务。现在民营企业融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上的障碍,但是改进有关规则,促使这些规则的有效执行,仍然是监管部门面临的重大问题。

### 巴菲特坦承美国富人交税率过低

沃伦·巴菲特(美国亿万富翁)6月29日在为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举行的筹款晚宴上说,包括他在内的美国富人税率过低,他去年收入为4600万美元,在没有刻意避税的情况下,其中17.7%用于交纳所得税。而他的秘书去年收入为6万美元,其中30%交了所得税,占人口1%的富人税负占税率比“我们的接待员,甚至清洁工都低”。他呼吁富人们考虑其余99%人们的处境。

### 通胀是增长最大风险

西蒙·约翰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6月26日在一个新闻吹风会上说,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有望超过原先预计的水平,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压力也随之升高,通胀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尽管全球范围内通胀压力呈上升趋势,但到目前为止,金属、能源、食品等商品价格的上涨尚未推动消费价格水平普遍上升。只要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继续集中精力控制通胀预期,物价上涨风险将不会破坏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

## ■慕尼黑随笔

# 金融博弈：小心为自己的弱点买单

◎梁雨霞

中国端盘子服务员,委委屈屈地像小媳妇,平均一个月大约挣一万人民币;德国端盘子服务员,像侍客的主人一般有尊严,客人接受服务时,唯恐服务员不高兴,临走还要例行公事地给小费,这么着,一个月大约也能有一千欧元以上的净收入。到了中国,这钱能以一当十地花。

有经济学家说,全球化的浪潮,会逐渐抚平不合理的价格差距,资本认钱不认人,同样的工作,理应得到同样报酬,否则,为了追逐更高利润,资本必定会竞相流入低成本地区。

然而,理论毕竟是理论。理论上,石油价格应该是缓慢上行的,直到被其他能源替代,但事实上,石油价格一直在动态的震荡中。为什么?因为拨弄市场价格这根弦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长短粗细不同的指头代表着不同的利益。

人民币该不该升值,该升多少?这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端盘子的服务员,该不该获得与西方同行一样的报酬?从公平和道义上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事实却不是这么简单。

比如,按理说,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利,何乐而不为?然而,长期的出口导向政策,让我们不在乎贱卖,只在乎是否卖得出,因为一旦卖不出,工人就会失业,设备就会闲置,材料就会贬值。此其一。

又比如,人民币升值后,若能稳稳地在高位“站住”,不失为好事——尽管手头的外币债权缩了水,但与庞大的且源源不断生产的人民币资产相比,这点债权算什么?问题是:人民币能稳稳地呆在高位不动吗?显然不能。此其二。

那么,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在高位“站稳”?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摆在世人的面前:国力弱,本币就坚挺;反

之,本币是强势货币,在贸易中必然可以交换到更多利益,从而有助于国力的巩固。显而易见,人民币的升值,不符合西方长远利益。

那为什么西方迫不及待地要求人民币升值呢?

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同时,西方总是有附带的要求,即,人民币实行弹性汇率制。为什么要弹性?司马昭之心,再明显不过:先迫使人民币快速升值,升到一定程度,把手里各种人民币资产抛出,使其大跌,自己获利退出。至于身后是否洪水滔滔,喝着庆功酒的绅士们是没有功夫考虑的,在英语中,“利息”和“兴趣”,是同一个词,对于投机家们来说,“趋利”是深植于骨子里的东西。

迫使人民币快速升值,对于西方来说,是“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最快捷径。不过,因为其他国家的历史教训在先,中国强顶着压力不升值或升值缓慢,是几乎可以预见的,为此,西方一边叫嚷,一边另辟蹊径。

于是,我们看到,金融大门一开,过剩的流动性,犹如一股怪气,窜到哪里,哪里就病恹恹地鼓胀。人民币不升值,大量游资就去追逐各种人民币资产,人民币资产涨价,而汇率也同时上升,等于是抬高了人民币的升值幅度。

钱是什么?钱是信用,是安全感的度量。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任由他人恣意冲撞,搅得天翻地覆,安全感何在?信用何在?人民币冲上高点后,能“站稳”吗?

说来说去,羊钱要吸的血,是中国人的血汗。对此,国人必须有所警醒并自卫。自卫其实并不难,一切的经济骗子,都拿精明而不高明的人开刀,比如股市,如果中小股民不盲目追涨杀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就能更加有效地打击投机者,这等于间接保护自己。

可惜的是,印花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浮躁与不负责任的风气,一种只看重眼前利益的短视自私的习惯。买者自负,忠言逆耳,为自己的弱点买单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小股民自己。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 傅筑夫最后十年惊人冲刺

◎梁捷

在何廉、方显廷、顾惠庆、陈序经等几位学者苦心经营下,自20世纪20年代起,南开大学始终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教学,他们培养出国内第一批教育部承认的经济学硕士;调查,他们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华北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后来扩展演变成所谓的“南开指数”;研究,他们引入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走在当时国内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

鼎盛以后,南开仍然冒出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比如李陶达、滕维藻等。还有一个奇人叫丁洪范。他的主业本是财政和统计,但无书不读,对中国经济现状极有研究,同时也极其天真自负。50年代初期,他针对当时经济学教育的思路,提出“二马结婚”。一个马是马克思,另一个马则是马歇尔。丁洪范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可以调和起来,相互补充,不必为了推崇马克思而全面否定马歇尔。当然他对于这个观点吃尽苦头。几十年以后,樊纲等学者顺着丁洪范的路子旧话重提,突然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傅筑夫跟南开的关系虽然不早,但影响却深远,因为他毕生的专著几乎都是在南开完成的。1982年4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南开大学经济学科首批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及指导教师为:世界经济滕维藻、中国经济史傅筑夫。让人感叹的是,此时傅筑夫先生已经80高龄了。他的生命之旅只剩下了最后3年。

傅筑夫先生出道很早,上世纪20年代初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从那时他就开始独立研究《资本论》。1928年26岁时,他尝试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讨论中国制度,写成并出版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和实际》。

看傅先生的简历可以明白,他原是个极有热情和关怀的人,研究经济和社会制度只是他的兴趣之一。他踏进大学,决定选择化学为专业。后来有幸结识了鲁迅先生,受他指点学问和鼓舞,决定转入国文系。那段日子里,他曾花过很大气力搜集整理古代神话史料。虽然人没能看到他的神话学研究成果,但是他有大量殷商甚至更古的社会经济制度研究,引用材料极为娴熟。很明显,这靠的是他研究神话史打下的底子。

20年代末,正赶上所谓的“社会史大争论”。陶希圣连出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等著作,认为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近百年来,在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工业革命未能完成,而农业工业趋衰衰落。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形态,亦即中国革命的起因。陶希圣此说一出,学界震动极大,各种批评此起彼伏。陶希圣则调入北大,创办《食货》杂志,利用搜集整理经济社会史的史料来为自己的社会史观辩护。年轻的傅筑夫也卷入了这场大论战。

1928年起,傅筑夫先后被河北大学和安徽大学聘为教授,讲授经济学原理和农业经济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在《图书评论》上发了好几篇有分量的书评,讨论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等书。虽然双方在社会性质的判断上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史料和方法上有共通之处。傅筑夫反对用朝代来武断划分社会时期。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有周期性的起伏,但从秦汉以后就有完整的脉络。就在这个时期,他初步提出了西周封建制和中国历史上几次经济大波动的划分。这一观点至今仍为很多学者所认同。

1932年起,傅筑夫改任中央大学教授,正式讲授中国经济史。1936到1939年间,他远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系统地补习了现代经济和经济史理论,然后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回国以后,傅筑夫意识到,空洞地争论社会性质在战争年代已无实际意义。若想踏踏实实做学问,还是得拾起整理资料的老本行。于是他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到1949年,他足足整理出几大箱笔记,分类条编,并在每章前附有简短的说明和分析。这是傅筑夫第一轮的资料收集工作。之后,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傅先生这项工作停顿了几十年。到1957年,他在南开大学再次启动搜集,1966年被迫停止。

不幸的是,傅筑夫这两轮各有十余年之功的资料积累,后来多有散逸,且没能与读者及时见面。到1977年,傅先生终于发动起他最后一轮冲刺。现在人们有幸看到傅先生和王毓湘先生合编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第一卷,范围是“秦汉三国编”,可以窥得傅先生学问的一斑。可后面几卷的出版恐怕遥遥无期。

傅先生最后一轮冲刺力量十分惊人。他在1977到1978年间写就了十四篇极长的论文,以专题形式涵盖整个中国经济史的核心,后来结集成《中国经济史论丛》2卷本出版,一直是经济史学生的必读书目。傅先生又在1978年承受《中国经济通史》的写作任务,很快就完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又是2卷本,这还不算,一口气又为这本书续写了3卷,连成连续性的体系。此外,他还完成了一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为《中国经济史论丛》续写了一册“续集”,前文提及的《中国经济史资料》亦是这段时期所编定。

傅先生自出版处女作以后,只是在1956年出过一本《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的小册子,仅50余页,没有其他专著。可到1985年去世前夕,他留下的书稿已足以等身,使得出版社在他身后忙了好多年。

我现在学习傅先生晚年留下的那么多扎实严谨的论述时,感慨之余,又总有一丝丝的遗憾。